



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研究丛书

自由： 发展可能性空间的扩展

徐邦友◎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研究丛书

自由： 发展可能性空间的扩展

徐邦友◎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发展可能性空间的扩展 / 徐邦友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8

ISBN 978-7-5161-8887-3

I. ①自… II. ①徐… III. ①自由—研究 IV. ①D0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730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2.5
插页 2
字数 365 千字
定价 7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党校文库编委会

主 任：陆发桃

副主任：徐明华 何显明

成 员：陈立旭 胡承槐 方柏华 王祖强

郭亚丁 董根洪 何圣东 林学飞

《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方柏华

副主编：郭亚丁 董 明

编 委：徐 彬 邱 巍 李晓敏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

人必须每天都去争取生活和自由，
才配有自由和生活的享受。
我愿看见人群熙来攘往，
自由的人民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

——歌德

自由是发展的最大可能性空间。一个社会如若没有自由，则只有一种可能；而若有了自由，则一切皆有可能。

——作者题记

目 录

导论 理想的国度：自由、规则、秩序、繁荣	(1)
第一章 自由：发展的最大可能性空间	(27)
一 自由的界说	(28)
二 自由的逻辑理据	(33)
三 自由何以有助于发展	(45)
四 自由促进发展的典范	(52)
五 如何看待后发国家的超常发展	(69)
第二章 市场与自由	(76)
一 市场：一种自发形成的社会秩序	(77)
二 市场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自由空间	(101)
三 妨碍市场自由的因素	(116)
第三章 规则与自由	(126)
一 规则的理由	(127)
二 规则如何保护自由	(150)
三 自由的规则	(160)
四 规则的信守	(172)
第四章 政府管制与自由	(183)
一 政府管制：一种微观干预的制度安排	(184)
二 政府管制对自由的双重影响	(199)
三 政府管制的次生效应	(214)
四 政府管制的合理定位	(227)
第五章 公共服务与自由	(235)
一 公共服务是实现自由的必要条件	(236)

二 公共服务对公民自由的潜在性影响	(254)
三 与公民自由相容的公共服务制度安排	(274)
第六章 自由的条件	(295)
一 自由是人类永恒的理想	(296)
二 自由的敌人：破坏自由的力量	(319)
三 维护自由的条件	(328)
参考文献	(343)

导论 理想的国度:自由、规则、秩序、繁荣

自古以来,人类就有对理想国度和美好社会的憧憬和追求。尽管这个向往之中的理想国度和美好社会有时显得十分遥远朦胧,有时又以近于讽刺画的形式令人颇感失望,但所有这些都无法平息人们对理想国度和美好社会的热情。人类依然以近乎痴迷的心态竭尽其想象力编织着理想国度和美好社会的壮美蓝图。

在古典中国的夏商周三代,我们的先民在自己的诗词歌赋中简单直白朴素地表达了对理想国度和美好社会的向往。“誓将去汝,适彼乐土”,就是对暴政社会的抗议和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在《礼记·礼运》中,作者向我们描述了两个虽然有等级差距但同样都不失美好的社会:大同和小康。“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从此,大同小康就成为中国人关于理想国度和美好社会的代名词。

春秋战国是中华思想文化最辉煌灿烂的时期。面对着亘古未有的社会大变迁,诸子百家纷纷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及学术见解,其中既有夏商周三代美好时光的留恋追忆,又有对残酷现实的无情批判,更有对未来理想

社会的设想和憧憬，许多思想灵光如闪电神火灿烂夺目，许多方案设计别开生面耐人寻味。老子之“鸡犬之声相闻而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设想；庄子的“至德之世”和“无何有之乡”；孔子的“仁政社会”和孟子的“王道世界”；墨子“交相利、兼相爱”“一同天下之义”的“尚同国度”，无一不是对理想国度和美好社会的真情呼唤。他们从自己所栖居的现实出发，针对现实生活境界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痛苦，运用当时社会所提供的思想材料，展开想象的翅膀，以如椽巨笔为我们描绘了未来理想国度和美好社会的画卷。在这些五花八门的理想国方案中，有异想天开的幻想，有对现实生活深刻观察后的升华，还有切近实际的描绘，有的是现实主义的，有的则属批判现实主义，有的是浪漫主义的，还有的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相结合。^① 不论属于什么类型，都有深刻的思想和隽永的哲学意涵，有些思想观点，如“无为而治”“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等，至今还闪耀着真理的光辉。而孔子的仁政，孟子的王道，墨子的尚同，则成了古典中国政治理想的典型形态，一直为世人所津津乐道，直至新中国成立，才被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所取代。

如果说思想家对理想国度和美好社会的思考，主要偏重于哲学的思辨和理性的设计，那么，文学家对理想国度和美好社会的设想，就极富浪漫主义情调了。在一个为高山峻岭所包围而与世隔绝的地方，有一个景色秀美民风古朴的乡村社会。那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他们自称是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在这里，我们感觉到历史的时钟停留在人类童年的某一刻，那就是作家眼里的黄金时代。

在西方，对理想国度和美好社会的探求也十分古老。最著名的就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是一个哲学家当国王，或者国王就是哲学家的国度，在那里，由不同材质做灵魂的人各居其所应居的地位，灵魂由金子做的人是城邦的统治者；灵魂由银子做的人是城邦的武士或卫国者；而具有

^① 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页。

铜铁材质灵魂的人如农夫、鞋匠、铁匠以及小商小贩则是城邦的物质供养者。这三个阶层各居其位，各行其是，忠于职守，这个城邦就是正义的城邦或者善的城邦。从此，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国就如同梦幻一样吸引着追求幸福的人们，它在历史的烟尘中，始终向人们展示其永恒的魅力。

基督教出现后，人们深感现实生活的失望，把追求理想国度和美好社会的目光转向了天国，人们在上帝的永恒之城找到了自己的最后归宿，而把现实国家视为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驿站。基督教的天国是一个乌托邦，和所有乌托邦一样，这个乌托邦是其现实世界的反面、颠倒镜像。^①

近代史，最摄人心魄的理想国度和美好社会就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所虚构的乌托邦，热衷于虚构和描述乌托邦的思想家是如此之多，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莫尔、康帕内拉、摩莱里、马布里、巴贝夫、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等，而莫尔是虚构乌托邦社会的第一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之翘楚。他用拉丁文字写了一本名著，书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他在书中描述了一个叫阿布拉克萨的新月形岛屿。全岛分布着 54 个城市，规模都差不多，个个宏伟壮观，设备完善。首府亚马乌罗提位于岛的中心，便于四方代表聚会。这里彻底废除了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土地、房屋、生产工具、个人消费品等一切财产都为全民所有。居民的住房每隔十年要通过抽签调换一次，以防居民产生私有观念。乌托邦的基本经济单位是家庭。农村每户成员不少于 40 人，城市每户不少于 16 人，外加儿童若干人。家长是德高望重的老人，指挥全家的生产劳动。户与户人口不平衡，可以互相调整。农业不是乌托邦人的固定职业，而是全邦人轮流从事的产业。乌托邦居民实行农业义务劳动制度，每人轮流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两年，以免得大家过较长期的艰难稼穡生活而于心不甘。当然如果有人喜欢农村生活，也可以在农村多住几年。而每个城市家庭只从事某一种手工业生产，不愿从事这种手艺的儿童可以自由地加入别的家庭。因此，虽然称之为家庭，但相互之间并不肯定有血缘关系，这种家庭其实是共同生产劳动共同生活消费的最小社会共同体。在乌托邦，人人都需要劳动，都需要掌握一种或几种劳动生产技能，职业是不固定的，既有统一的安排，

^① 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海南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7 页。

也可以自由选择。但不论是什么领域，生产都必须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以避免生产无政府状态和不必要的劳动。由于人人参加劳动，每个人的生产时间并不长，但社会产品却极为丰富，足以供社会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每个家庭把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交入公共仓库，并从公共仓库领取家庭生活所需的一切。令人惊异的是乌托邦人是如此高尚，以至没有人会多领取超出自己所需的生活物资，哪怕是一丁点儿。乌托邦城市每三十户办一所宽大的公共食堂，居民基本上都在公共食堂用餐；若不愿在公共食堂用餐，也可以从公共仓库领取生产物资在自己家庭里单独开伙。由于实行完全的公有制，这里除了对外贸易还保留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外，乌托邦内部不存在商品和货币；人们视金钱珠宝黄金如粪土，用金银做便桶溺器或者镣铐奴隶与犯罪的锁链。在全民公有的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是完全民主的政治制度。乌托邦的各级官员一律由民主选举产生，如不称职随时可以撤换。重大事务都由民众大会讨论决定，任何长官个人都不能擅自决定，否则以死论罪。各级行政官员也没有任何特权，同人民群众在经济上政治上完全平等，他们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政府及其官员的职能就是组织生产和管理人民的经济生活。在乌托邦里，虽然还有法律，但并不复杂，只有简单的几条根本大法，用来维护人民的福利和民主权利，而且因为简单而人人精通，没有专门凭借自己的法律知识鱼肉百姓的职业讼师。由于有丰裕的经济生活和优良的政治生活，乌托邦人的精神面貌乐观开朗，人人关心集体，个人热心公共事业，时刻注意把公家的仓库充实起来。他们绝不会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而只愿牺牲自己的所得，以成全别人的所得，并把这视为自己应该承担的博爱人类同情人类应尽的义务。

应该承认，这个理想国度和美好社会，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其美好动人之处，仍具有崇高的道德价值。恩格斯就充分肯定了以莫尔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伟大贡献，指出他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同时也指出其理想蓝图的空想性质，^①并分析它们之所以为空想的原因在于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思出新社会的轮廓，因为这些轮廓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3页。

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只能求助于自己的理性而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① 乌托邦社会也许是完美得极致了，反而让人怀疑其实现的可能性。莫尔自己也深知这一点，所以把自己的这个理想国度和美好社会称之为“乌托邦”（拉丁文 Utopia），意谓“子虚乌有的地方”。从此，乌托邦就成了那些“美好但不现实的理想蓝图”的代名词。

人类为什么始终会有对理想国度和美好社会的追求？

1. 现实生活中的压迫剥削掠夺使人们对现实生活深感失望，从而产生对理想国度和美好社会的主观向往

自从产生了私有制、私有观念和私人利益，自从伴随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产品的消费剩余，从而为一些人利用自己的优势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提供了可能，人与人之间压迫剥削和掠夺也犹如幽灵一样徘徊在人类社会中。“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轮兮，置之河之湄兮，河水清且沦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一曲诗歌唱尽了那些被压迫被剥削者所遭受的苦难。智慧的老子说：天之道是损有余以补不足，而现实社会的人之道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这是人类社会在根本上的大逆反，是一切灾祸的肇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子·第七十五章》）孟子以其犀利的笔锋触破了统治者蒙在社会表面温情脉脉的面纱，揭露了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刺目对立。“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这样的社会真犹如“率兽而食人也”，简直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原始丛林。

压迫越沉重，剥削越刻骨，现实越苦难，人们对理想国度和美好社会的向往越强烈。生活的苦水浇灌出来的理想之花也最鲜艳夺目。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思想文化最活泼繁荣的时期，处士横议，诸子百家都有自己关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7页。

于理想国度和美好社会的理论学说，他们相互竞争，各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天下之人非儒即墨，非墨即法，各家学说都有自己的信徒。理想之花的竞相绽放，就与这个时期礼崩乐坏、圣王不作、诸侯放恣的乱世景象有很大关系。

在西方历史上，理想国度与美好社会的思想也和现实的苦难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罗马帝国是靠残酷的奴隶主专政来维持的，阶级等级极其森严。处于最底层的是无数受苦役的奴隶，在锁链和鞭笞下劳动，比牲畜还不如，还有成百万侍候奴隶主的家务奴隶，他们同样是奴隶主的财产，生杀予夺任由摆布。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会说话的牲畜，随时可被奴隶主处死。直到哈德良统治时期（117—138年），才规定处死奴隶要有理由。当时一个奴隶主被暗杀，他家的所有奴隶都予以处死。对奴隶的死刑不是斩首，就是钉死于十字架上，或在斗兽场喂野兽。罗马帝国对东部各行省人民的统治也十分残酷，除了掠夺金银财宝外，还强占大片耕地、牧场、森林、矿场、鱼塘，把可耕地分给移居殖民地的罗马公民，土地的收益大部分被帝国政府攫取，小部分为罗马公民占有。还有一批罗马商人到东部行省经商，开设店铺或放高利贷。这些残酷剥削使帝国东部经济凋敝，百姓生活困苦。残酷的剥削压迫激起了奴隶和被征服地区人民的反抗，这种斗争从未停息。64—65年，罗马帝国各行省发生大饥荒。66年，巴勒斯坦全境犹太人民大规模起义，罗马帝国的行省长官派三万军队前往镇压；68年，罗马军队攻陷耶路撒冷，几乎每块土地上都有死尸伏于其间，侵略军纵火焚毁全城。起义失败的耶路撒冷居民被罗马征服者钉死于十字架上；此外还有七万多人被变卖为奴。面对着无从摆脱的现实磨难，这些社会的弱者只得把希望寄托于幻想之中，寄托于超自然的神。于是，以缓解人民精神痛苦为主要宗旨的基督教就应运而生了。它为人们描述了一个理想的天国，那里有永恒的幸福，与之相比，现实的苦难就已经不算什么了。而且，忍受现实的苦难也是对自己灵魂的考验，是通往天国道路上必须过的一道坎。也许正因如此，宗教才被马克思称之为“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

而自圈地运动以来，西方近代史上之所以出现那么多的空想社会主义方案，也同样和社会大变革过程中底层劳动者所遭受的苦难有关。圈地运动就被莫尔称之为“羊吃人的运动”，那些因此而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被迫

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而当时英国对流浪者制定了苛暴的法律进行严惩，或被送进监狱，或被送上绞架。他们没有办法只得流入城市，进入工厂，置身于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之下。现实的苦难逼得他们去寻求精神慰藉，否则从肉体到心灵非要崩溃不可。因此，那些虚构乌托邦社会的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在底层百姓中特别有市场，人们如痴如醉地阅读欣赏，并真心相信有这么一个理想社会能够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实现。恩格斯在比较原始基督教和近代社会主义思潮时，就曾指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与现代工人运动有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产生时也是被压迫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基督教是在死后彼岸的生活中，在天国里寻求这种得救，而社会主义则是在现世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两者都遭受过迫害和排挤，信从者遭到放逐，被待之以非常之法：一种人被当作人类的敌人；另一种人被当作国家、宗教、家庭、社会秩序的敌人。虽然有这一切迫害，甚至还直接由于这些迫害，但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胜利地、势不可挡地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①

2. 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是人性不可磨灭的部分

人类有追求美好生活的天性，它犹如火焰始终在暗暗燃烧。不同时候，这团火苗可能大小强弱明暗不同，却从不曾灭熄。即便在一些宣扬世界末日的宗教信徒心中，末日审判后建立的依然是一个永恒幸福的千年王国。这说明他们心中依然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非他们心中理想的生活不在此岸世界，而是在彼岸世界。我国先秦时的法家人物慎到就持人性好利说；商鞅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商君书·算地》）还说“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民之欲宝贵也，共阖棺而后止。”（《商君书·赏刑》）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韩非也认为人性好利，这种本性无须改造，也改造不了，倒是应该尊重和顺应，利用民之好利的本性实现统治者的目标。马克思也坦然承认，人们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5页。

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表现有多种形式，追求利益的目的在于过上更好的更有意义的生活。人为地搞出利义二元分割，并且认为百姓好利，这其实是一些自诩道德高标的人对民众追逐自我利益的一个略带贬义的承认而已，其实在好利的背后，是社会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我们认为这种向往和追求是天经地义的，也是无可厚非的，因而自然成了我们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①自己过着钟鸣鼎盛锦衣玉食的奢靡生活而指责百姓好利，就显得不厚道和虚伪了。既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人性不可磨灭的部分，那么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就始终会有关于理想国度和美好社会的理论思想和制度设想。历史上关于理想国度与美好社会的理论学说和制度设想之层出不穷，体现的正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本真天性。

3. 以之作为批判现实的理论武器

人类还有一种关于理想国度和美好社会的理论学说和制度设计，其提出并非真的是为了在将来某个时候得到实现，也许主张者自己也非常清楚他的那一套理想蓝图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还是要提出来，其目的是为了批判现实，是为映衬现实的丑陋性，并希望通过现实的理想主义批判促进现实的改善。甚至有时，现实能否因此得到改善也不是他所关心的，他只在意提出一个他自认为圆满完美的理想国方案。我们切不可因此而忽视这种理论学说和制度设想的意义。它们是可能在任何现实的技术功利层面上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无用之物亦有可用之处，而且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在东西方漫长的历史上，都不乏这种无技术之用的理想国方案。

比如庄子的至德之世和无何有之乡，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梦想。他在自己的文章里多次描述过至德之世的状况。“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羈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马蹄》）“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

^① 习近平总书记对记者见面会上的讲话，2012年11月15日。

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庄子·天地》处于至德之世中的人们，“居不知所之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衣；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庄子·让王》）庄子把这种生活情状称之为“天放”。在其中，没有知识，没有技术，没有制度，也没有礼仪，一切我们后人称之为文明的东西都不存在，只有纯自然的存在。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庄子的理想国方案是反历史的、反知识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反社会的，是一种向后看的理想。有学者说庄子的乌托邦只怕比“北京人”还来得更古些。^①而人类总是历史地展开，知识也是越积越多，尽管知识越来越多不见总是越来越好，也能够从社会中获得孤身独立所不可能具有的益处。因此，庄子的理想国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庄子的理想国方案没有意义。庄子也许真的想回到过去，但这也是因为他看到了技术知识给人类生活带来的扰乱与破坏，看到了制度礼仪对人的真性自由的约束，尤其看到了一些人对制度礼仪的盗用给人们和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他说：“夫弓弩毕戈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罟罔筍之知多，则鱼乱于下矣；削格罗落罟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知诈渐毒颀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矣。”《庄子·马蹄》而那些连带把仁义制度礼仪一并盗窃的窃国大盗们则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可以利用自己掌握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礼仪给自己的任何行为贴上合法正当的外衣，至此，还有什么他们不敢为的呢？对技术知识、制度礼仪及其滥用给人类带来的消极影响的清醒觉识和准确把握，这是庄子比许多其他人深刻的地方，也是最值得我们注意和警惕之处。建立在此种认识基础上的理想国方案，虽然没有实现的可能与价值，但已足以引起我们对何谓理想社会的反思。这就是庄子理想国方案的价值意义所在。

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也是一个没有实现之逻辑可能性的理想国方案。对此，柏拉图自己非常清楚，他用一个关于哲学家的寓言故事把其中的道理告诉了我们。他说有一群人终其一生都栖居在洞穴里，从不曾走出洞穴。他们拥挤在洞穴中央面壁而坐，在他们的身后，是一团熊熊燃烧的

^①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0页。

火光，这团火光把洞穴里的东西包括人体形象都投射到洞穴的墙壁上。人们只看见墙壁上这些光影，而从不曾看见这些光影之所由来的事物本身，因而，误把这些光影当作事物本身，并对此坚信不疑。有一天，有一个人偷偷地爬出了洞穴，来到太阳底下。强烈的阳光把他的眼睛刺痛，但他很快适应阳光下的环境，并借助阳光看到事物本来的面目。他发现事物本身与以前在洞穴里所看到的并非一致，洞穴里所看到的并非是事物真相，而只是关于事物的一个虚幻的光影，他过去是一直被虚幻的光影给欺骗了。现在终于认识到事物本身，掌握了关于事物的真知。柏拉图把这个掌握了关于事物本质之真知的人称之为哲学家。现在哲学家面临两个选择，或者返回洞穴，告诉洞穴里的人以事物的真相；或者留在太阳底下，继续享受获得真知的幸福快乐。毫无疑问，哲学家会作出第二个选择。他不愿意再回到洞穴，去忍受光影的欺骗了；即便他愿意回到洞穴，告诉洞穴里的人们关于事物的真相，他想说服他们也是困难的，因为离开了阳光回到洞穴，他看到的影子还不如别人那么清楚，而且在别人看来，他仿佛比逃出去以前还要愚蠢，根本不如洞穴里的人聪明，因此，也不会相信他。由此，决定了哲学王统治在现实的城邦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柏拉图眼里，哲学王统治与其说是一种可供选择的现实政治范式，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哲学理念，一种对现实有批判力的理想摹本，一种只有天上才有的“神圣的原型”；一个纯粹的圆，它只映衬着现实所有圆的不圆满性，有了这个理念的“圆”作参照，现实的“圆”才有变得更圆的可能与希望。

因此，理想是人类的超越性精神活动，是“某种并非以自我为中心而被愿望着的东西，从而愿望着它的人也希望所有别的人都能愿望它”。^①理想使人免于堕落平庸的物欲主义的苟且的生活，从而使自己和生活都展示出一定程度的道德崇高性。由于有理想的存在和召唤，现实的苦难就显得不那么可怕和令人窒息了，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相信苦难是暂时的，幸福终将到来，理想使他们具有活下去的信心、希望和勇气。同样，由于有理想的激励和洗涤，世俗现实生活的污垢多少能够得到一些净化，生活的品位和境界也会有相应的提升。人类没有理想，与饱食终日的猪或行尸走肉也就没有多大差异了。

①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6页。